

与新中国共同走过 60 春秋

——访著名翻译家、作家、外国老专家沙博理

王 莉

来到北京友谊宾馆雅园公寓,我按响门铃,迎接我的是一位鹤发银眉的老人。他,就是美裔中国籍翻译家、作家沙博理先生。老人身穿白底蓝条短袖衫,下着白色短裤,与北京街头的老者没什么两样,惟有那高鼻梁和深眼窝在提醒我——他是一位有着外国血统的老专家,然而他更愿意被看作是中国人。

参加开国大典—— 心随中国人民一起跳动

1915年,沙博理出生在美国纽约。青年时代他做过律师,二战期间应征入伍,退役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上海结识了著名演员和作家凤子。当时凤子正在党的指导下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人世间》。1948年,沙博理和凤子在上海结婚。在凤子和进步朋友们的影响下,他开始了解中国社会,逐渐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由同情转而投身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一道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们坐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沙博理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真让我终生难忘。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可能是太激动了,然后突然‘哗’地全

场激动欢呼、高兴地啜泣的声音全出来了,凤子也哭了。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加入中国籍,却和大家一样地激动。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因为我知道,也见过中国的旧社会,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我感觉确实如此。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一个人,精神上真正站起来了!”

沙博理从此定居中国,并以外国专家的身份满腔热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依靠自己力量摆脱悲惨命运的奇迹,而且亲身参与了这一奇迹的创造。他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并为自己能成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感受到了生活的非凡意义。

成为中国公民—— 甘为新中国奉献一生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成为中国公民。选择加入中国籍,源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目标和政策的认同,他喜欢这里的文化生活和社交生活,感到自己在北京会比在美国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他常说:“我爱上了凤(指凤子),也爱上了龙(指中国)。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



沙博理(右一)和凤子(右二)与老朋友马海德(左一)、路易·艾黎(右二)在一起。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是世界上一直有人类居住的最古老城市之一。考古论证,早在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8000年,这里就已有人类踪迹。千百年来,各种人类文明绵延不断,使大马士革没有成为中国的楼兰或意大利的庞贝那样的城市遗迹。

大马士革与地中海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由于两重黎巴嫩山脉横亘其间,阻隔了地中海的水汽,造就了大马士革亚热带沙漠性气候。然而就在这沙漠性气候中,却神奇地矗立着一座雪山——谢赫山。谢赫一词源自阿拉伯语,原意是白头发的老人,由于顶着雪冠的山就像一位白发老人,所以常住大马士革的中国人称它为“老头山”。谢赫山给原本是沙漠气候的大马士革带来了一条巴拉达河,它拥有7条支流。在巴拉达河的灌溉下,一个名为“乌涛”的绿洲环绕大马士革。“乌涛”绿洲盛产水果,一到春季,桃李之花一望无际,成为绵绵花海,中国人谓之“杏花村”。

传承数千年的大马士革老城就位于巴拉达河北岸,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今天市区内的巴拉达河支流已基本断流,空留下宽阔的河道。但始自公元前12世纪阿拉米时代的城市供水和排水系统,至今仍是大马士革老城区城市用水系统的基础,堪称奇迹。

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一连串照亮人类古代历史的文明都在这座伟大城市留下了痕迹。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的统帅庞培都曾君临大马士革。公元636年,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的伊斯兰教伴随着强悍的阿拉伯骑兵,席卷西亚大地。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二任哈里发(伊斯兰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奥马尔征服了大马士革。公元661年,大马士革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成为疆域西起西班牙东至印度的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首都,这一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伍麦叶王朝覆灭,新的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今天大马士革最大的清真寺

天堂大马士革

杨俊

天堂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空中,大马士革必与之齐名。”这是阿拉伯古书中关于大马士革最为“露骨”的赞美。人生岂可错过天堂?

人类文明变迁的步伐。而同时你会发现,在那些看似专为游人和人类学家而准备的城市历史陈述中,大马士革人却仍在依靠它们过着现代的生活。历史与当代在这里衔接得如此妥帖,令人叹服。

在著名的古老市场哈米迪亚,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能在这里买到。几乎与哈米迪亚同时期的开罗哈利利市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为游客服务的旅游市场。此刻你会领悟,大马士革为什么又被称为“活着的最古老的城市”,因为它不仅古老,而且那些古老的设施今天依然在正常运转,也许这正是这座古城的魅力所在。

“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空中,大马士革必与之齐名。”这是阿拉伯古书中关于大马士革最为“露骨”的赞美。人生岂可错过天堂?

沙博理先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做英文翻译。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后,他来到杂志社与叶君健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等人一道从事翻译工作。1972年又调到人民画报社。沙博理相繼把《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等大量中国现当代小说译成英文,介绍给各国读者。他翻译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更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前些年,沙博理受邀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译成英文,并与作者毛毛(邓榕)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翻译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之余,沙博理还出版了不少个人专著,除自传体著作《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外,还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如《四川经济的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

自1983年沙博理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直连任至今。由于他为中国对外宣传事业所做出的富有成果的工作,为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所做出的贡献,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沙博理的书柜里,我看到了他和朱镕基、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沙博理说,每年春节,总理都要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外国专家,“那是特别好的机会,可以跟总理坐在一起,向他提问,向他学习。”

在沙博理身边,有许多像他一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毕生的老朋友,提起他们,他满含深情:“马海德医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曾给我许多人生的指引和忠告,我写作《马海德传》,就是要表达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路易·艾黎则是另一位良师益友,我们的友谊从1947年的上海一直延续到1987年艾黎去世;埃德加·斯诺是个了不起的人,正是由于他的鼓励,我开始写自传和回忆录。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病危时,我正从美国探亲回国途中,特地转道飞往瑞士,却遗憾地没能赶上见老朋友最后一面……”沙博理与这些老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们所钟情的第二故乡——中国。

无悔人生选择—— 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沙博理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有很好的运气,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们的政府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发现年轻一



94岁的沙博理精神矍铄地在北京寓所中接受记者采访。王莉摄

代也是大有可为的。他们的知识比我们更丰富,视野比我们更开阔,一代会比一代强。”沙博理十分关心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他对群众路线在有些地方执行不力表示担忧。采访中,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上面满是他最近阅读时做的标记,他翻到其中一页,指着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向我说明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94岁高龄的沙博理是伴随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老专家之一。他曾这样总结他的不凡人生:我很荣幸自己见证并参加了世界历史上最英勇无畏的革命之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得到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不仅使中国摆脱穷困重新站了起来,而且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力量。我一直深信这场革命的伟大目标一定会实现。中国在继续前进,沿着一条新的未知的航线,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宇宙中迂回曲折地奋勇前进。中国革命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获得和平与繁荣的更好的机会。

这是一位始终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外裔老人的肺腑之言,他为这片深爱的土地奉献着一生,更为她的沧桑巨变感到无上光荣。



与新中国同行



曾毅摄于英国爱丁堡

今年60岁的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让喜欢他小说的读者等待7年之后,于春夏之交的5月末推出了新作——两卷本长篇小说《1Q84》。新作空前畅销,据出版商新潮社统计,截止到7月下旬,上卷销售123万册,下卷销售100万册,8周内共印刷18次,在日本各家书店销售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前茅。分析畅销原因,一是作者广受关注;二是新作问世前严格保密,出版的消息令人意外,小说内容也没有导读。《1Q84》讲的到底是什么故事?作者和读者有什么感想?

《1Q84》以1984年的日本为舞台,第一卷写4月至6月,第二卷写7月至9月,两卷共分24章,奇数章写的是健身俱乐部工作的独身女青年青豆,偶数章写矢志做小说家的青年教师天吾。故事人物多是新兴宗教的信徒,颓废、暴力、虐待、淫乱等扭曲生活,贯穿于他们在1984年4月至9月的几乎所有时间和空间。

《1Q84》中的“Q”,与日文中的“9”发音相同。关于书名,村上春树说:以前就曾想过,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未来小说(1984)为基座,写一部讲述“近过去”的小说。据介绍,《1Q84》的字数,如果按每页400字的稿纸计算,正好是1984页。

村上春树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1995年奥姆真理教制造了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后,我采访了60多名沙林事件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采访了8名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写了《在约定的场所》。其后我曾经尽可能地旁听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对于奥姆真理教信徒的审判。对于沙林事件的愤怒难以平息,同时我最

是,无论工作,还是私生活,现代人都具有不为人知的‘并行世界’。村上春树是想通过‘并行世界’,描写统一化人格崩溃的现代人们。日本作家三轮太郎说,对于《1Q84》,有人说是恋爱小说,有人说是反新兴宗教小说。我认为的是日本的诊断记录。30年来,作者往来于国内海外,与他对金融危机、超老龄化的诊断相比,他对日本病根

的诊断则更加深刻。半个多世纪前敌人清晰可见,现在敌友难以区别,人的思考在无知觉中受到支配。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将这个无形的支配者形象地称之为“空气蛹”。人逃脱不了“空气蛹”,也捣毁不了,如果捣毁了,自己也在其中。为了对抗“空气蛹”,只有用自己的身心创造自身的“空气蛹”。可以说这是日本的诊断记录,或许也是全球的诊断记录。作者通过人性论和存在论的交织、通过复杂的故事铺陈、通过美好印象的造型,展开深刻的社会批

游学归来,新加坡河那泓清静的河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在新加坡期间,我听得最多的是关于水的故事。水,柔韧中透着坚强,当它遇到阻挡时,它就会用自己的温柔把障碍化解于无形中;纵有千般阻隔也挡不住水流奔腾的脚步。新加坡人关于水的故事,充分折射出新加坡人民的性格和特质。

新加坡人具有水一般的坚韧。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07平方公里的岛国,水对于新加坡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用水原本根据建国前与马来西亚所签订的两份水供协议,由柔佛州经新马长堤引入新加坡。但马来西亚试图把水供当作最有力的谈判筹码,新加坡就这样曾经一度被水资源的短缺所困扰。可是,如今的新加坡,不仅用水供应充足,而且正在计划把现在的花园城市国家打造成为一个水上城市国家,这样的成就,是新加坡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得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把

水源问题当作国家战略予以优先考虑,他们把目光转向海洋,并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世界一流人才,采用高新技术、实现海水淡化。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就建立了遍布全境的雨水收集系统,兴建了4座新生水厂,实施了海水淡化,使淡水自给率达到40%。就这样,当水资源问题成为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新加坡却依赖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成功解决了自己的水源,从一个受他国水供制约的岛国,转化为国际瞩目的环球水务枢纽,向世界各地提供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水问题解决方;并催生了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品牌运营为核心、金融资本为纽带的环保与水务产业。新加坡的水故事堪称一个奇迹。事实上,新加坡还在电子工业、教育、医药等方面创造了许多世界奇迹。如果没有刚强和坚毅,又怎能创造出这些奇迹?

新加坡人具有水一般的柔和。静静的新加坡河从城市中穿流而过。河面移动着三三两两载满客人的游船;河两边是悠闲漫步的人们,他们中间有新加坡人,也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他们在享受新加坡的灿烂阳光、明净天空、新鲜空气的同时,也在感受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国度的和谐。在新加坡期间,我特别注意到,尽管新加坡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人惊叹,尽管国际舞台上时常闪现新加坡人的身影,但是,新加坡人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傲气,各种族人群和睦相处,整个城市宁静有序,街上甚至很少见到霓虹灯,晚上只有路灯放射出柔和的光芒。这个国家似乎始终保持着一份平静、谦逊和矜持,始终处于一种沉思状态。

新加坡政府具有水一般的透明。如今的新加坡河清可见人。当我们走进反映新加坡历史的新加坡蜡像馆时才知道,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河水一片乌黑,河面上横七竖八的小货船,承载着来自国外劳工的无限辛酸;河水发出的难闻气味,让人远远地就要掩鼻。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就开始治理新加坡河流。如今的新加坡河清澈见底。这正如新加坡政府的公正和透明。新加坡前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新加坡人民是幸运的。1996年,李光耀曾被人指控贪污,因他在购房中享受了优惠,李光耀坚决要求政府调查,并数次在国会公开说明,最后核实是开发商对先购房者给予的商业优惠。李光耀此后曾自豪地说,能够有人请他到国会就此事做说明,他看到了新加坡未来的希望。如今的新加坡,虽然也会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但是,那些贪污腐败者注定要为他们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离开新加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那静静的河水仍在我的心头流淌……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gjfk@pd.people.com.cn

国际副刊

这是《1Q84》最本质的功绩。

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的评论令人视野更加开阔:“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疑问。读完村上春树最新的长篇小说《1Q84》,似乎十分自然地会想到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空翻》,因为两者的题材都选择了新兴宗教。尤其是村上春树对小说中的教主的描写,无论是场景的细节,还是教主的心路历程,乃至为人物设定的对话都叫人联想到日本的‘山岸会’。这是一个靠农活维持所有收入,同时平分每人家产的共同生活机构,其组织系统之严密鲜为外界所知。村上春树曾经以奥姆真理教为题材写过纪实类小说,但从选材上看,没有这

次的《1Q84》深入,尤其从新兴宗教发展到邪教的过程,小说展现的场面似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样是日本文学的大手笔,尽管日本媒体说大江健三郎与村上春树之间没有任何私人的交往,作品风格以及读者群也大不一样,但无独有偶,偏偏在新兴宗教这个题材上同出一辙。说白了,两位大作家对邪教以及装神闹鬼的把戏如此热衷,其中必有理由可讲!往后得空再往深处想想看,也许能从另外的文本上摸到日本文学的大动脉。”